

• 文学研究 •

关于苏轼对孟浩然诗歌的评价问题

——析“韵高而才短”的长期误读

杨胜宽

(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乐山 614004)

摘 要:苏轼评价孟浩然的诗“韵高而才短”,历来认为是对孟浩然诗歌创作不足的批评。其实,苏轼的这一评价,是在高度肯定前提下而指出其不足。因为“韵高”是苏轼论诗的一个很高艺术境界。关于孟氏“才短”,向来解说纷纭,但多与苏轼的本意不符。本文通过分析认为,苏轼所谓“才”,主要指作家内在道德素养和诗歌创作表现有机结合的综合能力,是一个以“学养”为核心的诗学批评概念,持此以衡量孟浩然的生活与诗作,是有所欠缺的。因此,苏轼对孟浩然的评价,是深刻而客观的。

关键词:孟浩然;仕隐矛盾;田园生活;诗歌韵味;诗才;学养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8505(2010)01-0034-07

On Su Shi's Comment on Meng Haoran's Poetry

— Analysis of Misinterpretation in “Exquisite Rhythm with Shallow Content”

YANG Sheng-kuan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Leshan Normal University, Leshan, Sichuan 614004, China)

Abstract: “Exquisite rhythm with shallow content”, made by Su Shi has been regarded as a comment on the defect of Meng Haoran's poetry. Actually, Su Shi pointed out Meng Haoran's weakness with his appreciation for “exquisite rhythm” is a high praise for art achievement. The various explanations of “Shallow content” are mostly misread of Su Shi's original meaning.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Ca”, mentioned by Su Shi refers to a poet's ability to integrate moral qualities and poetic expressions, a critical concept focused on knowledge and improvement. Su Shi's comment is deep and objective, however, it is not appropriate to say Meng Haoran's comprehensive ability is deficient.

Key words: Meng Haoran; in-between official career; pastoral living; poetic flavor; poetic talent; knowledge and improvement

一、“韵高而才短”所指何意

从现存的文献中,能够考察苏轼对唐代著名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直接评价的,主要是见于“苏门六君子”之一陈师道《后山诗话》中的一处记载:“子瞻谓孟浩然之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1]308}虽然只有这样简短的一句话,却被历来的论者所一致信崇,不少人认为是孟浩然诗的定评。然而,人们祖述者多,却很少深入去寻思其中的真正涵义。北宋陈师道之后,南宋张戒在《岁寒堂

诗话》中,也提及苏轼对孟浩然的评价,而表述略有不同:“论诗文当以文体为先,警策为后。若但取其警策而已,则‘枫落吴江冷’,岂足以定优劣?孟浩然‘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之句,东野集中未必有也。然使孟浩然当退之大敌,如《城南联句》,亦必困矣。子瞻云:‘浩然诗如内库法酒,却是上尊之规模,但欠酒才耳。’此语尽之。”^{[2]459-460}通过孟浩然与孟郊、韩愈的比较,认为孟浩然能够写出孟郊难以企及的警策诗句,但他的最大不足在于诗才有限,驾

收稿日期:2009-09-25

作者简介:杨胜宽(1958-),男,教授,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

取不了格局宏大的诗歌篇章。

我们今天已经无从考索苏轼评价孟浩然诗歌那句话的具体语境了。从用比喻的方式把自己的观点形象化、通俗化的表达风格看,《后山诗话》应是传达了苏轼的原意。但是,直到今天,人们阐释最多的是苏轼批评孟浩然“才短”,而“韵高”表达了苏轼什么样的评价观念,依然难觅确解;且“韵高”与“才短”之间的关系和关联何在,更不明究里。

即以“才短”之“才”言,有人认为是指诗人作诗之“材料”,显然这是直接受了苏轼比喻的影响。清人施闰章《蠖斋诗话·诗用典故》云:“古人诗入三昧,更无从堆垛学问,正如眼中着不得金屑。坡公谓浩然诗韵高才短,嫌其少料。评孟良是,然坡诗正患多料耳。坡胸中万卷书,下笔无半点尘,为诗何独不然?”^{[3]378}把“才”理解为“才学”,即在诗歌创作中表现的学问,如果使事用典严重到“堆垛学问”的程度,就成为诗歌思想感情表达的遮蔽,是有害的东西。从这个意义讲,孟浩然的诗不仅不是缺点,反而是最大的优点了。这样,苏轼的批评就很难成立了。

也有人将苏轼所说的“才”理解为“才思”,如清人叶燮《原诗·外篇》云:“孟浩然诸体似乎淡远,然无缥缈幽怨之思,如画家写意,墨气都无。苏轼谓‘浩然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诚为知言。后人胸无才思,易于冲口而出,孟开其端也。”^{[4]604}根据叶燮“孟大不如王(维)”的整体判断,则所谓“才思”,是指诗人的思想、思维与表达能力,可见他对孟浩然是趋于基本否定的,而苏轼却明确肯定孟诗“韵高”,是在总体肯定的前提下批评其不足,叶氏的理解显然并非苏轼的本意。

现代学者闻一多则既把苏轼所谓“才”理解为跟“量”对应的“质”,即诗人的“才质”、“才情”,他说:“他(孟浩然)的诗是不多,量不多,质也不多。量不多,有他的同时人作见证,杜甫讲过的:‘吾怜孟浩然……赋诗虽不(当作‘何必’)多,往往凌鲍谢。’质不多,前人似乎也早已见到。苏轼曾经批评他‘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这话诚如张戒在《岁寒堂诗话》里所承认的,是说尽了孟浩然,但也要看‘才’字如何解释。如果专指‘才学’,还算没有说尽。‘情’当然比‘学’重要得多。说一个人的诗缺少‘情’的深度和厚度,等于说他的诗的‘质’不够高。孟浩然诗中‘质’高的有是有些,数量总是太少。”^{[5]34}又理解为诗歌中使用典故事类等所

显现出来的学问,故说:“东坡说他(孟浩然)没有才,东坡自己的毛病,就在才太多。”^{[5]35}

钱锺书则径直把“才”理解为创作时过度使用的修辞技巧,苏轼批评孟浩然的话成为钱锺书批评苏轼的最好证据。他说:“苏轼的主要毛病是在诗里铺排古典成语,所以批评家嫌他‘用事博’、‘见学矣然似绝无才’、‘事障’、‘如积薪’、‘窒、积、芜’、‘獭祭’,而袒护他的人就赞他对‘故实小说’和‘街谈巷语’,都能够‘入手便用,似神仙点瓦砾为黄金’。他批评过孟浩然的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这句话恰恰透露出他自己的偏向和弱点。”^{[6]73}

以上各种说法,不能囊括解说苏轼关于“才”的所有观点,仅此而言,已足以看到历来解读的纷繁了。

由于历来把“韵高而才短”视为苏轼对孟浩然的批评,便自然只注意苏轼批评其“才短”是否恰当,而对“韵高”一词视而不见,似乎苏轼所看到的孟浩然,只有不足的一面。这既不符合苏轼评价人的一贯方式,也不是苏轼评价孟浩然的原意。事实上,苏轼以“韵高”评价一种艺术风格,那是很高的赞誉之辞。《书黄子思诗集后》云:

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废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至于诗亦然。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秣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7]2124}

这是苏轼常被人们引述的一段名言。它对本文印证苏轼评价孟浩然诗歌“韵高”的本意也很重要。

首先,这段话中既出现了“韵”的概念,又出现了“才”的概念,表明他是在同一个语境中使用这两个概念的,并且是把两个概念联系起来阐明观点。人们知道,苏轼对李白、杜甫是极为推崇的,特别是杜甫,不仅称赞他是集诗歌艺术之大成的诗人,而且认为其胞民与物的仁者情怀,是历史上任何一位诗人都无法与之比并的。李、杜之后,唐代诗歌由高峰走向衰落,诗人们虽然偶尔能够体现出古人的流风

遗韵,但是他们的才能却不能充分表达其思想情意,难以创作出高风绝尘、萧散简远、自得天成的浑然而作。“间有远韵”的“间”,指创作过程的偶尔,创作整体的局部,诗人可能在某一个得意的创作瞬间,能够达到超常的发挥,写出可与最伟大诗人媲美的杰作;诗人也可能在一首作品中创作出神来之笔,写出脍炙人口的警策之句,流传于世。而苏轼所着眼的,是对一个时代及那些诗人的整体判断,他认为李、杜之后,没有出现过具有卓越诗歌才能的诗人。显然,这里的“才”,不只指诗人创作时可供使用的诗料,也不单指诗人的学问大小,而是包括了作为诗人的综合素质、修养和创作能力,即通常所说的诗歌创作才能,这种才能体现在创作中,不仅要具有博取众长以为已有的吸收消化与综合能力,而且要最终超越古今,卓立于世以成一家之言。中间既有学问积累的成分,又有道德情操的成分,还有独立创新的成分,而后两项,是苏轼最重视的内容。按照这样的标准,李杜以后罕有够此标格的,韦应物、柳宗元算是极个别的例外。

其次,什么样的作品才够得上有“远韵”的艺术境界?苏轼虽然未作正面表述,但我们从他的整段话中还是能够看出一些标准性的表述。一是“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他在上述的跋文中还引述了唐末诗人兼诗歌理论家司空图的一段论诗名言:“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为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司空图是唐代诗论家中最提倡“韵味”的人,罗根泽评价司空图在中国诗歌批评史上的最大贡献是“力谋建立诗境”,^{[8]234}是深有见地的。司空图所说“美在咸、酸之外”的韵外之致,实际上就是苏轼所说的“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的诗歌艺术境界。二是“发纤秣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这里的“至味”类似于司空图所说的“味外之味”或“美在咸、酸之外”的韵致,与前面说的表现在笔墨之外的“妙”,是异曲同工的;而“发纤秣于简古”、“萧散简远”,又与苏轼在写给弟弟苏辙的信中称赞陶渊明“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9]1402}的评价颇相近似,均指一种朴茂浑然、大巧若拙而回味悠长的艺术境界。凑巧的是,苏轼极为赞美的陶渊明、韦应物、柳宗元等诗人,都是中国诗歌史上对山水田园诗歌创作作出过突出贡献、并占有重要地位的诗人。苏轼评价作为唐代山水田园诗歌重要代表之一的孟浩然诗歌“韵高”,这是相当

高的肯定和赞美。当代学者张海鸥在所著《北宋诗学》一书中论及苏轼对孟浩然的评价认为:“苏轼说孟浩然诗韵高,并将孟喻为‘造内法酒手’,这是很高的评价。”但没有展开论述。^{[10]149-150}总体看,历来对此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是非常令人困惑的现象。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清楚看出,苏轼对孟浩然诗歌的评价,是总体高度肯定而指出其不足。可以作为佐证的是其《夜直玉堂携李之仪端叔诗百余首读至夜半,书其后》所提到对孟浩然诗歌的印象:

玉堂清冷不成眠,伴直难呼孟浩然。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11]1616}

虽然这里是称赞李之仪的,但显然孟浩然的诗是他记忆中印象甚佳的“好诗”,阅读起来是一种令人愉快的艺术享受。当然,以他对诗人才能的高要求看,孟浩然确实有所欠缺。就这个意义而言,苏轼对孟浩然的评价是一分为二和恰如其分的。

二、孟浩然的性格及仕与隐的矛盾

一生只活了五十来岁的孟浩然,除了中间短暂的两三次荆楚、吴越之游,一次上京应考和在张九龄幕府的有限幕僚生涯外,基本上就在家乡襄阳鹿门山过着田园布衣生活。他的这种生活方式,在盛唐时代士人热心功名、专求闻达的背景之下,是相当另类的。不要说边塞诗人岑参、高适等人的英雄主义理想和建功立名的勃勃雄心;就是科场屡屡失意的杜甫,也曾尝试过干谒朝廷显贵和向皇帝献赋希求赏识的种种努力,并在长安苦等十年;甚至连十分看不起科举考试的李白,成天梦想的仍然是一朝被明主超常拔擢,实现其“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政治抱负。而孟浩然对于时人朝思暮想的仕途功名,却是出奇的淡漠。据他的好友王士源在其死后作的《孟浩然诗集序》中记载:

山南采访使太守昌黎(韩)朝宗,谓浩然闲深诗律,置诸周行,必咏穆如之颂,因入秦,与偕行。先扬于朝,约日引谒。后期,浩然叱曰:‘业已饮矣,身行乐耳,惶恤其他!’遂毕久不赴。由是闻罢。既而浩然不之悔也。其好学忘名如此。^{[12]432-433}

这段逸事在《新唐书》本传中也有类似记载,而增加了“(韩)朝宗怒,辞行”数字。朋友王士源是以十分理解和赞赏的口吻叙述这件事的,但如果放在孟浩然的时代背景去看,就成了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情。首先,就算孟浩然此时已经有了些诗人的名气,

但他那个时代勇于进取的士人,恰恰不满足于一生只“以诗名”,他们更热心于沙场建功、出将入相。这件事所显示的是孟浩然与众不同、与时不侔的人生路径与价值取向。其次,别的人千方百计寻求达官显贵引荐扬名,而孟浩然所遇是送上门来的机会,韩朝宗本想把他推荐给朝廷,发挥他在文学方面的才能,并且煞费苦心地在京城为之揄扬,还定下了“引谒”的时间。可是,临行之际,孟浩然却在与好友饮酒,把那挡子事忘到了九霄云外,别人提醒他,倒被抢白了一顿!这不仅仅是对功名感不感兴趣的问题,实际上完全缺乏对别人的起码尊重,更何况这个人是要主动帮助他!在孟浩然留存至今的诗歌中,尚有三首是跟韩朝宗有关的,分别是《和张判官登万山亭因赠洪都督韩》、《送韩使君除洪州都督韩公父尝为襄州使》、《韩大使东斋会岳上人诸学生》,观其“郡守虚陈榻,林闲召楚材”(《韩大使东斋会岳上人诸学生》)^{[13]308},知道在孟浩然眼中,韩朝宗是很爱才的;而从“无才惨孺子(东汉徐穉子),千里愧同声”(《送韩使君除洪州都督韩公父尝为襄州使》)^{[14]242}的告白中,可以看出他是以韩朝宗的知音自许的。因此,作为地方官和知音朋友的韩朝宗极力引荐他,应该是在情理之中的。第三,从孟浩然“业已饮矣,身行乐耳,惶恤其他”的自白看,他是一个任性而喜欢自在生活的人,结合他晚年病疽在身却与好友王昌龄纵情饮酒而卒的情节看,即使他被推荐到朝廷里做一个“翰林待诏”之类的官,恐怕也是长不了的。他一生以布衣终,应该是性格所决定的。单纯而宁静的田园生活,只适合与时代节奏不甚合拍的孟浩然。难怪传说那次在王维的住处突遇唐玄宗造访,玄宗读了他的“不才明主弃,端居耻圣明”诗句,要有“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15]441}的嗔怒之语了。

从史书的记载和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孟浩然是一个不谙世故、具有典型诗人气质、且性格倔强的人,他的朋友王士源概括其为人:“骨貌淑清,风神散朗,救患释纷以立义,灌园艺圃以全高。交游之中,通悦倾盖,机警无匿;学不故儒,务掇菁华;文不按古,匠心独妙。”^[12]《旧唐书·文苑传》则说他的一生“以诗自适”。^{[16]441}这是很能抓住其性格和生活特征的。这样的诗人性格和生活方式,是苏轼相当欣赏的,他对孟浩然的诗歌作出“韵高”的评价,正是基于对其为人的高度肯定。

从孟浩然的诗歌中,我们的确看到他早年也曾具有入世的热情,《伤岷山云表观主》云:“少予学书剑,秦、吴多岁年”^{[14]319},他年轻时代也走的是一般士人求仕之路,科考和游历成为其生活的主要内容。《书怀贻京邑同好》云:“三十既成立,吁嗟命不通。慈亲向羸老,喜惧在深衷。甘脆朝不足,簞瓢夕屡空。执鞭慕夫子,捧檄怀毛公。感激遂弹冠,安能守固穷。当途诉知己,投刺匪求蒙。秦楚邈离异,翻飞何日同?”^{[14]170}他承认因为贫困生计所迫,“感激”而参加科举考试,请求显达引荐拔擢自己,心情颇为急切。但这样的入仕动机是有相当勉强色彩的。我们从他的诗中,很难看到发自内心的远大政治抱负,以及为之孜孜以求的执著追求。事实上,在很多这类题材的诗中,体现出他在仕与隐选择上的矛盾与苦闷,以及稍遇求仕挫折即以退隐自慰的一贯心态。《答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云:“跃马非吾事,狎鸥宜我心。”^{[17]107}《京还赠张淮》云:“拂衣何处去,高枕南山南。欲徇五斗禄,其如七不堪。早朝非晚起,束带异抽簪。因向智者说,游鱼思故渊。”^{[17]121}《自洛之越》云:“惶惶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扁舟泛湖海,长揖谢公卿。且乐杯中物,谁论世上名。”^{[14]217}这类言辞在孟浩然的诗中不胜枚举。他向张淮剖白的心情,与当年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自述挂冠归隐的心情全然相同。对于一个喜欢自在散漫生活和追求精神满足的诗人而言,口腹的欲望虽然重要,但它无法凌驾于精神生活的满足之上。何况他有祖传的“旧业”,只要稍事劳作,管理好自家的田产,就可以衣食无虞。

《南山与卜老圃种瓜》云:

樵牧南山近,林间北阁赊。先人留旧业,老圃作邻家。不种千株橘,唯田五色瓜。

邵平能就我,开径有蓬麻。^{[13]324-325}

《涧南即事贻皎上人》云:

敝庐在郭外,素产唯田园。左右林野旷,不闻朝市喧。钓竿垂北涧,樵唱入南轩。

书取幽栖事,将寻静者论。^{[13]337}

就像鲁迅评价陶渊明说的,只有退隐衣食无忧,陶渊明、孟浩然们才可以去悠然作诗。在孟浩然为数甚多的山水田园诗歌中,读者能够充分领略诗人其乐融融的清新而平静的生活情趣,从中可以看出他对生活乐趣和人生价值的体味。

《田家元日》云:

昨夜斗迴北,今朝岁起东。我来已强仕,无禄唯尚农。桑野就耕父,荷锄随牧童。

田家占气候,共说此年丰。^{[13]326}

在靠天吃饭的农耕时代,季节和天气是劳作者必须熟练掌握运用的重要自然条件。孟浩然跟农夫一样,学会了从北斗星所处的位置来判断节气,而岁星起于东方则意味着应该开始春耕了;他在田野里与农民一起劳动,傍晚随着牧童归来;他与农民有着共同的期盼,希望一年的辛苦能够换来一个丰收而不受饥寒的年成。虽然中间也有几分“我来已强仕,无禄唯尚农”的无奈,但他已习惯村野的环境与生活,处身其中有了惬意的归属感。此诗与读者熟悉的《过故人庄》一样,他不仅习惯,而且喜欢上了田园生活的简朴,以及与周边人和物关系的纯洁与和谐。

《秋登万山寄张五》云:

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相望试登高,心飞逐鸟灭。愁因薄暮起,兴是清境发。

时见归村人,沙行渡头歇。天边树若荠,江畔洲如月。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17]135}

诗人笔下的秋日万山所见,纯是一幅美丽的水墨图画,白云、飞鸟,暮色、归人,树影、江洲,这些富于诗情画意的意象,在诗人的眼中是如此赏心悦目,令人陶醉神往。这一切是喧嚣的市井见不到的,也是无此心境情趣的奔竞之人欣赏不了的。

读孟浩然的诗让人感受到,处于仕与隐矛盾彷徨中的诗人,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变化,他的功名愿望不断消解,而安于山林田园的意识不断强化。大约四十岁左右,他就很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生活方式和人生路径是适合自己的,尽管有时难免也发牢骚感慨,但他已经没有改变田园生活的决心与打算了。

孟浩然长期生活在环境简单、节序重复的乡间,虽然使他远离争斗的官场和喧嚣的世俗,从而保持了诗人的艺术天性与纯洁心灵,但这种生活环境和生活阅历也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了他的创作视野和丰富体验,这种局限性在孟浩然的诗歌创作中是有所反映的,苏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的批评。

三、“韵高而才短”表明了苏轼的什么评价观念

上文已经指出,“韵高”是苏轼对孟浩然诗歌的很高赞誉。为什么在肯定孟浩然“韵高”的同时又

批评其“才短”呢,这体现了苏轼什么样的创作与评价观念?

首先,我们知道,苏轼是中国历史上才华横溢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政治家,上至皇帝、同僚,下至政敌、普通民众和他的学生,都对此一致公认。但苏轼所真正推崇的历史人物,并不是那些纯以才智取胜的人,而是气节见识过人的德才兼备之士。他在评价西汉政治家贾谊时,就毫不客气地指出:“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18]106}认为这是他政治上难有大作为的根本弱点。霍光“才不足而气节有余”,^{[19](109)}因此,汉武帝委以捍社稷、托幼子的政治重任,他能够取得成功。苏轼由此得出的历史结论是:“欲有所立于天下、击搏进取以求非常之功者,则必有卓然可见之才,而后可以有望于其成。至于捍社稷、托幼子,此其难者不在乎才,而在乎节;不在乎节,而在乎气。”^{[19](109)}有卓然之才者,可以成就非常之功,而要成就不世之功,气节比才能更加重要和难得。表明苏轼对于人才评价,是以德才两全为基本标准,而将德行放在首位的。

其次,苏轼对于文艺作品的评价,一个最重要的尺度,就是衡量作品艺术品质与作家道德品质的一致性,认为诗品、书品出于人品。从这样的标准出发,他特别推崇晋宋之交的田园诗人陶渊明和唐代诗圣杜甫。苏轼中年以后,特别喜欢陶渊明诗,故遍和陶诗,得 109 首,汇集而成《和陶诗》,嘱其弟为序。苏辙《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引》述其言曰:

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9]1402}

苏轼最推崇陶诗的理由,是“质而实绮,癯而实腴”深厚韵味,是其“性刚才拙,与物多忤”的“为人”。^{[9]1402}也许说陶渊明超过曹、刘、鲍、谢、李、杜有些过誉,但他从陶氏人品与诗品的高度统一的标准,看到了其诗的珍贵价值。正是经过苏轼的极度褒扬,陶诗在中国诗歌发展史的地位与影响,得以最终确立。

杜甫的情形也是如此。苏轼针对当时学习模仿杜诗的风气发出感慨:“天下几人学杜甫,谁得其皮与其骨?”“名章俊语纷交衡,无人巧会当时情”。^{[20]1157}“皮”“骨”之喻,“语”“情”之论,尖锐批评学杜诗者得其皮毛而遗其人品精神的本末倒置之法。《评子美诗》曰:

子美自比稷与契,人未必许也。然其诗云:‘舜举十六相,身尊道亦高。秦时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自是契稷辈人口中语也。……乃知子美诗外尚有事在也。^{[18]2105}

杜甫超越古今之处,不仅在诗歌方法技巧本身,而且在诗外的作家心胸气概。经过苏轼等人对杜诗内在价值的深度挖掘,其为古今诗人之“称首”的地位与影响,得到了历史公认。^[21]

苏轼在《书唐氏六家书后》明言:“凡书象其为人。”然后分别评述各家书法风格,如谓“永禅师(释智永)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复不已,乃识其奇趣。”“率更(欧阳询)貌寒寝,敏悟绝人,今观其书,劲峻刻厉,正称其貌耳。”“张长史(张旭)书,颓然天放,略有电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而那些心术不正的小人,书法风格也与之相称:“世之小人,书字虽工,而其神情终有睚眦侧媚之态,不知人情随想而见,如韩子所谓窃斧者乎!”^{[22]2206}《跋钱君倚书遗教经》更言:“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辩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志不可乱也。”^{[22]2186}看来艺术作品是人的心声之表露,其风格必然反映作家的性格和精神世界,是有一定道理的。

第三,苏轼主张,作家的艺术水平提高,必须致力于内在道德修养和综合素质的不断完善,作品艺术境界的提升,必须基于作家综合修养与素质能力的提升,这就是他提出的“技道两进”思想。他在《众妙堂记》里说:“技与道相半,习与空相会,非无挟而径造也。”^{[22]362}技与道两者相伴而成,缺一不可。所以他在《跋秦少游书》中明确提出:“技进而道不进则不可”。^{[23]2194}《书黄道辅〈品茶要录〉后》曰:“学者观物之极,而游于物之表,则何求而不可得。故轮扁行年七十而老于斫轮,庖丁自技而进乎道,由此其选也。”^{[24]2037}只有长期所“习”积累的技能与经验是不够的,还必须“空”诸己,摆脱自己的经验束缚,完成“进乎道”的内在提升和对故我的超越,才能最终达到完美的艺术境界。

第四,苏轼认为各种艺术具有共同的创作规律,作家应该融汇贯通多种艺术形式,在继承中创新,在融合中突破。要达到这样的要求,作家就必须具备多方面的才能,努力成为多面手。他对杜甫的诗,韩愈的文,颜真卿的书法,吴道子的绘画,极尽赞美之

辞,认为他们在这些领域达到了集古今之大成的水平,空前绝后。但这样的成就不是某一个人一蹴而就的,而是若干代人逐步积累完善而成。《书吴道子画后》云:

智者创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25]2210}

经历如此漫长的智者创造、能者继承的过程,始能达于极致。对于处在文明史发展进程中的个人而言,不断学习,努力创新,是自身充实完善的必由之路。因此,苏轼十分重视作家的学习养成过程,《稼说》云:

古之人,其才非有大过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养而不敢轻用以待其成者,闵闵焉如婴儿之望长也。弱者养之以至于刚,虚者养之以至于充。三十而后仕,五十而后爵,信(伸)于久曲之中,而用于至足之后,流于既溢之余,而发于持满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于学,不幸而早得与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谓不早也。吾今虽欲自以不足,而众且妄推之矣。呜呼,吾子其去此而务学也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吾告子止于此矣。^{[26]340}

苏轼所说的今人不及古人未必是事实,重要的是他对“学养”的重视与小心呵护。他忧心自己和朋友成名(考中进士)太早,不利于自身的学养成就。所以告诫友人努力“务学”,进而提出了“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的著名观点,来阐明他关于学习继承、积累创新的创作思想。苏轼自己尽管天资过人,但他终身孜孜以学,夜以继日,其勤奋超过常人,所以能够在文学、艺术、思想、学术、科技等诸多方面取得卓越建树,不少方面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

我们了解了苏轼的才学思想和创作观念,就容易明白他对孟浩然看似矛盾的评价了。孟浩然疏离官场、退隐田园的诗性生活,是一辈子羁縻于仕途之中而吃尽苦头的苏轼所十分赞赏和羡慕的;他那种与物多忤、不与俗偕的狷者个性,也与苏轼的为人多有暗合;特别是他那种亲近自然、体味山水田园乐趣、与田夫野老相尔汝的生活姿态,及其由此形成的清新、平易、恬淡的诗歌风格,是苏轼终身极力追求的一种艺术人生的美好境界。这些都成为苏轼高度

赞赏肯定唐代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的重要因素。但是,孟浩然的生活方式与生活环境,又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其学养的提升与完善。苏轼批评孟浩然“才短”,这里的“才”主要指学养,它指包括学问、道德、社会阅历和情感陶冶在内的作家综合修养,是长期积累,逐步提升,不断完善的过程。此言致憾于孟浩然这些方面有所不足,使他在诗歌和其它艺术领域没有取得更大的成就,这应该是辨证而符合实际的评价。

附带指出,宋代相对唐代而言,在评价文人才能的标准和成才观念等方面都起了明显的变化。宋代士人更加看重学养培育和才能的多面性,所以读书人更加喜欢和习惯书斋生活,他们用这种标准去衡量唐代的士人,认为有些人学养不足,才能单一,因此颇多微词。宋神宗对李白与苏轼的评价,很能代表两个时代的人才观念。宋人赵葵《行营杂录》:“上一日与近臣论人才,因曰:‘轼方古人孰比?’近臣曰:‘颇似李白。’上曰:‘不然。白有轼之才,无轼之学。’”^[27]宋人更加重视一个人后天的学习修养、永无止境的内在自我完善过程。这种观念也广泛反映在作家的创作风格和士林对作品的评价上。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云:“有以诗集呈南轩先生(张栻),先生曰:‘诗人之诗也,可惜不禁咀嚼。’或问其故。曰:非学人之诗!学者诗读着似质,却有无限滋味,涵泳愈久,愈觉深长。”^[28]强调作家创作时要涵养学问,其作品才能耐人寻味,成为宋人普遍的创作追求和审美标准。如此看来,苏轼对孟浩然有“才短”的批评,就毫不奇怪了。

参考文献:

- [1] 陈师道·后山诗话[M]//历代诗话本(上).北京:中华书局,1981.
- [2] 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M]//历代诗话续编本(上).北京:中华书局,1983.
- [3] 施闰章·螭斋诗话[M]//清诗话本(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4] 叶燮·原诗·外篇(下)[M]//清诗话本(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5] 闻一多·唐诗余论·孟浩然[M].北京:中华书局,2004.
- [6] 钱锺书·宋诗选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 [7] 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M]//苏轼文集卷六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6.
- [8]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 [9] 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M]//栾城后集卷二十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10] 张海鸥·北宋诗学·苏轼的诗学思想[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
- [11] 苏轼·夜直玉堂携李之仪端叔诗百余首读至夜半,书其后[M]//苏轼诗集卷三十.北京:中华书局,1987.
- [12] 王士源·孟浩然诗集序[M]//孟浩然诗集笺注·附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13] 佟培基·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14] 佟培基·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15] 欧阳修,等·新唐书·文艺传[M]//孟浩然诗集笺注·附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16] 刘煦·旧唐书·文苑传[M].孟浩然诗集笺注·附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17] 佟培基·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18] 苏轼·贾谊论[M]//苏轼文集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9] 苏轼·霍光论[M]//苏轼文集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6.
- [20] 苏轼·次韵孔毅父集古人句见赠五首其三[M]//苏轼诗集卷二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7.
- [21] 杨胜宽·从崇杜到慕陶:论苏轼人生与艺术的演进[J].四川大学学报,2004(2).
- [22] 苏轼·跋钱君倚书遗教经[M]//苏轼文集卷六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6.
- [23] 苏轼·众妙堂记[M].苏轼文集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
- [24] 苏轼·书黄道辅《品茶要录》后[M].苏轼文集卷六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6.
- [25] 苏轼·书吴道子画后[M]//苏轼文集卷七十.北京:中华书局,1986.
- [26] 苏轼·稼说[M]//苏轼文集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86.
- [27] 颜其中·苏东坡轶事汇编[M].长沙:岳麓书社,1984.
- [28] 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M]//张高平·宋诗特色研究·新变代雄与宋诗特色.长春:长春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谭金蓉]